

Hudong Shijiao xia de
Xiandai Hanyu Yinshu Huiying Geshi Yanjiu

互动视角下的 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

王长武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互动语言学视野下的引述回应类构式研究”
(15YJC740077) 资助出版

Hudong Shijiao xia de
Xiandai Hanyu Yinshu Huiying Geshi Yanjiu

互动视角下的 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

王长武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动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王长武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680-3210-0

I. ①互… II. ①王… III. ①现代汉语-研究 IV. ①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682 号

互动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

王长武 著

Hudong, Shijiao xia de Xiandai Hanyu Yinshu Huiying Geshi Yanjiu

策划编辑:牧 心

责任编辑:唐诗灵

封面设计:孙雅丽

责任校对:曾 婷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5 插页:1

字 数:298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长期以来,应答语一直是汉语会话分析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些年来,随着话语分析的引入和借鉴,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研究手段的不断更新和提升,汉语应答语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质量持续提高。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当前应答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综合性、理论性研究成果还不多,结合特定语言学理论与有效研究方法的深层次探讨就更少了。

王长武的这本《互动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正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与尝试。本书从互动语言学和框式结构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范围与类别、构造与功能,都做了深入、详尽的分析与讨论。通过对引述回应格式的系统研究,作者提出了不少非常有创见的看法。

纵观目前的汉语语法研究,重视口语研究的成果不少,然而观察互动双方以引述对方话语的形式回应对方这种语法现象确实不多,从互动的视角关注这种表达形式的研究更少。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引述形式,其性质、特征、功能等与传统的引述有很大的不同,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本书作者综合借鉴了互动语言学、框式结构、引述理论、语法化、词汇化、构式等相关理论,并且通过大规模的语料检索,采取会话分析与语法分析、穷尽描写与充分解释、共时研究与历时考察、系统论述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的多种手段与方法,对汉语引述回应格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分析。

具体而言,本书作者选取了前人较少关注的应答现象,对一系列回应格式分别进行深入考察,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揭示了这些回应格式的表达方式与功效特点。通过详细调查与考察各种回应格式的用法与特点,作者分析了这些回应格式的共性和差异,并对使用中的一些特别现象做了相应的解释。与此同时,本书还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回应格式的形成和变化,并就回应格式的演化路径与形成机制展开分析,对一些具有汉语特点的回应格式,做了深入透彻的揭示。总之,本书作者尽量做到多角度参考前人的各种研究成果,认真借鉴有用的语言学理论,注意对各种具



体语料进行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因此,本书各个章节基本上都能做到分析有据、条理清楚,说明解释也相当到位,对相关的语言现象都做了合理有效的解释。本书无疑是迄今为止在探索汉语引述回应格式方面的一项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王长武是我指导的博士生,2013年至2016年,他在上海师范大学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在读博期间,他就有了前瞻性计划,准备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最终顺利获批。如今,他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研究成果要出版了,请我写序言,作为导师,我当然十分高兴:一来,他的研究成果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二来,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他学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作为老师,看到学生在自己的指导下不断成长,内心真是欣喜异常。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带了很多届博士研究生,但从不强求学生的研究方向必须跟导师保持一致。既然长武对口语对话中的一些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已经有了多方面的积累与研究心得,那我自然赞同他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一起确定了“引述回应格式”这一研究课题。

应该说,本书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实时口语互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本书的研究又是一个新起点,我认为,如何从互动视角进一步挖掘口语应答语的价值,将是长武将来必须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长武的研究特点就是勤于探究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他在上海这三年,不但完成了近30万字的学位论文,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目前已有几篇在《古汉语研究》《汉语学习》上发表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获批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课题。我相信,长武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张谊生

于上海师范大学

2017年5月10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语料说明	(15)

上篇 系统研究

第一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	(21)
第一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21)
第二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	(26)
第三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特征	(28)
小结	(39)
第二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范围与类别	(41)
第一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范围	(41)
第二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类别	(50)
小结	(64)
第三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框式结构分析	(65)
第一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结构分析	(66)
第二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固定部分	(69)
第三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可变部分	(76)
小结	(91)
第四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语用功能	(93)
第一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人际功能	(94)
第二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篇章功能	(103)
小结	(112)

下篇 个案探讨

第五章 引述-确认:表慷慨认同的引述回应格式“X 就 X”	(115)
第一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117)
第二节 “X 就 X”格式的句法语义特点	(119)
第三节 “X 就 X”格式的话语功能	(124)



第四节 “X 就 X”格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130)
小结	(135)
第六章 从反诘到肯定:表强调认同的引述回应格式“可不 X”	(136)
第一节 “可不 X”格式的特点和功能	(137)
第二节 “可不 X”格式的历时考察	(140)
第三节 “可不”的由来综论	(148)
小结	(158)
第七章 凸显理解难点:表质疑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 X ₁ ”	(159)
第一节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160)
第二节 “什么 X ₁ ”格式的语用特征	(166)
第三节 “什么 X ₁ ”格式与“什么 X ₂ ”格式的比较	(168)
小结	(174)
第八章 重新分析:表质疑的引述回应格式“你是说 X”	(176)
第一节 引述话语的选择	(178)
第二节 “你是说”的发展演化	(183)
第三节 “你是说 X”格式的会话交际特征	(186)
小结	(192)
第九章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你才 X”	(193)
第一节 “你才 X”格式的引述性特征	(194)
第二节 “你才 X”格式的内部特点	(198)
第三节 “你才 X”格式的语义特征	(202)
第四节 “你才 X”格式的语用功能	(206)
小结	(210)
第十章 反说话人预期: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还 X”	(211)
第一节 引述话语“X”的类型	(213)
第二节 “还 X”格式的否定方式	(216)
第三节 “还 X”格式的反预期功能	(220)
第四节 “还 X”格式的固化	(224)
第五节 “还 X”格式与相关格式的差异	(229)
小结	(235)
结语	(236)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59)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会话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由“引发语—应答语”构成的相邻对(Schegloff & Sacks, 1973)。在相邻对中,引述回应格式是频繁使用于应答语的一种特殊成分,指的是说话人在对引发语进行回应时,借助一定的语言手段引述前一说话人^①的全部或部分话语,以此表达对前一说话人话语的态度和认识,由此形成的形式和功能上已经凝固化,专门对引发语进行回应,有时还可以引导后续信息的序列配置^②。根据引述话语是否加引号,引述回应格式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说话人在引述话语上加上引号,以凸显其引述性特征。例如:

(1) “可是——”她有些发愣。

“别‘可是’了!”他打断她:“走吧,等车去!”(琼瑶《潮声》)

(2) 吴书记也无力地坐下了:“责任不在德国人,而在翻译?”

“什么‘在翻译’?!我看在我们!”郑副厂长在他们背后气恼地撂来一句。(张贤亮《浪漫的黑炮》)

另一类是在引述话语上没有加上引号,但是语言使用的直觉和经验使我们认为,即使不加引号,我们也还是可以按照引语的方式来理解。例如:

(3) “妈呀!”

“别妈呀,怕上昆仑山咱就吃不成一锅饭。”(张应银《昆仑女》)

① 本书所说的“前一说话人”是与“说话人”相对而言的,也称为“受话人”。与会话结构相对应的是,“前一说话人”或“受话人”的话语为引发语,说话人进行回应,前者和后者的话语构成“引发语—应答语”序列。

② 事实上,引述回应格式除了在对话语体中使用外,其用法也会逐渐扩展到独白语体中。例如:

(1) 傅老:“啊!我也知道啊,你是心里认错,嘴上不好意思说,不说就不说吧,小桂啊……”(电视剧《我爱我家》台词)

本书主要讨论引述回应格式在对话语体中的用法,所以引述回应格式的定义也据此而下。当然,在讨论中,我们也会关注独白语体中引述回应格式的表现。



例(1)至例(3)应答语中的“别‘可是’了”“什么‘在翻译’”“别妈呀”都是说话人借助一定的语言手段引述前一说话人的话语,表达说话人对引述话语的否定态度。

事实上,类似例(1)至例(3)应答语中的引述回应格式有很多,除了“什么X”“别X”,还有“还X”“你才X”“X个Q”“X你个头”“不是X,是Y”“岂止是X”“什么是X”“何止是X”“可不是X”“可不X”“什么叫X”“怎么叫X”“你是说X”^①“谁说X”“怎么个X法”“哪里是X”“X你妹”“X谈不上”“谈不上X”“X说不上”“说不上X”“X什么”“X什么X”^②“X是X”“X就X”“X才怪”“别说X”等。当然,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目的,上述格式、结构或者说构式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如果从对话互动的语境考察这些格式,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都具有引述回应功能。也就是说,这些格式都可以被说话人用来引述前一说话人的全部或部分话语,表示对对方话语的回应,既可以表达说话人否定的态度和认识,又可以表达说话人质疑、认同的情感态度。

因此,互动交际的双方以引述对方话语的形式回应对方,以此表达对对方话语的态度和认识,由此形成的引述回应格式,是专门用于应答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说话人在自己的话语中故意引入“对方的声音”,暗示或明示自己言说的内容并非来自此时的“我”,其用意在于传递对命题信息内容的主观态度和认识。同时,由于引述回应格式在会话语境中的高频使用,其句法—语义功能已经规约化,成为既具有人际功能,又具有篇章功能的固化语言单位。传统语言学认为,一个句子就是一个语言单位,它是单个表达者语言能力的产物。但从互动语言学视角来看,在口语互动过程中,句子的生成不但与表达者有关,而且与接受者密切相关。本书研究的对象——引述回应格式——就是表达者与接受者共同生成的产物,换句话说,互动交际的言语行为造就了引述回应格式的意义与功能。

如果我们把前一说话人的话语即引发语称为原述话语,记为S,应答语中的引述话语记为X,说话人借助的语言手段记为Z,那么上述引述回应格式可以称为ZX。很显然,具备上述特点的引述回应格式ZX在语义和功能上的联系组成了一个家族,

① 跟“你是说X”格式相似的还有“我是说X”“他是说X”等。“我是说X”引述的是说话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语,“他是说X”引述的是互动交际双方之外的他人的话语。由于本书主要研究互动交际的双方,以引述对方话语的形式回应对方,所以“我是说X”和“他是说X”格式被排除在研究对象范围之外。

② 朱军(2010)认为“X什么”“X什么X”是两个不同的格式,前者中的“X”只能为动词、形容词,后者中的“X”不仅可以是动词、形容词,还可以是名词、量词、副词、代词。实际上,能够进入“X什么”格式的成分已经有所拓展,如名词、副词、连词、拟声词、叹词等也能进入该格式,一些拟声词、连词、叹词、助词等也可以进入“X什么X”格式。前者是反问否定,受周围语境影响较大;后者是成熟的否定格式。基于以上内容,本书把“X什么”“X什么X”格式分开讨论。

但这些格式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子范畴。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虽然上述语言现象已经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从互动语言学和框式结构理论视角观察,引述回应格式数量众多,对其性质、特征、范围、类别、结构与功能等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和认识。

值得说明的问题有两点。

第一,从形式上看,类似例(1)到例(3)应答语中画线部分的语言单位,有些形成了短语,如“X个Q”等;有些是句子,如“你才X”“你是说X”“谁说X”等;还有些无法明确用短语或句子的组合规则去进行分析,如“别X”“什么X”“还X”。另外,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来看,有些已经构式化了,如郑娟曼(2012)把“还X”“什么X”“X个Q”称为引述回应式构式;有些形式和意义的某些特征,还可以从组成成分推导出来,如“你是说X”等。应该说,在不同的理论背景或研究范式下,上述语言单位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看到,它们虽然在形式以及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在言语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比较一致,即对作为引发语的原述话语进行引述并加以回应,所以我们在此不纠结于术语问题,统一用“格式”这个术语来概括这些由短语、句子以及非短语、非句子构成的构式与非构式的集合。^①

第二,引述回应格式专门用于应答语,由于在会话语境中高频使用,其句法—语义功能已经规约化,成为既具有人际功能,又具有篇章功能的固化语言单位。这种依托引发语生成的固化应答结构数量不少,“但又相对封闭,可以列举,形成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类聚”(尹世超,2008)。实际上,对引发语进行回应的固化话语成分还有很多,除了本研究所讨论的格式之外,还包括词、短语和小句。如“哪里”“笑话”“废话”“行了”“够了”“想得美”“哪里的话”“你说到哪里去了”“你还说呢”“我说呢”等。张谊生先生指出:“一般情况下,语法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句中的名、动、形三类实词是由于什么诱因和机制、遵循怎样的规律,虚化为表达语法意义的虚词和形态成分的。其实,语法化研究的着眼点也可以扩展到格式、小句等句法成分,乃至探讨语篇成分是怎么凝固化、关联化的。”(张谊生,2010a)因此,本书尝试探讨引述回应格式在对话互动的语篇环境中的凝固化与情态化特征。

^① 早期关于“格式”的研究涵盖了语汇格式、语法格式和修辞格式,范围较广。如武柏索等(1988)认为,在日常口语或书面语中,无论是虚词还是实词,只要在互相搭配中是比较常见和固定的,都可算作“格式”。张志公(1959)不仅分析了语法格式,如单句格式和各种复杂谓语句格式,还讨论了语汇格式。莫彭龄(1986)认为“格式”不仅有语法的,还有语汇的和修辞的,因此,语法、语汇和修辞“格式”的区别和联系,也是“格式”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书根据李振中(2008)的说法,将“格式”限定在狭义范围内,指的是大部分位置上的结构成分不可变化,只有某个位置上的成分可被同类的其他成分所替换的一种语法框架结构。



综上所述,本书将聚焦于对话语体,即典型的互动语境,与引述回应格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主要关注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特征、范围、类别、结构与功能,探索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使用和选择引述回应格式的话语意图与目的,并通过个案分析挖掘其在互动交际语境中固化的动因与机制,尝试探讨互动交际行为对语法塑造、语义演变的影响,并以此挖掘应答成分固化的本质与规律。

本书所讨论的引述回应格式是用于应答语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已经为语法学家们所关注,但是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我们主要探讨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特征、范围、类别、结构与功能,目的在于探索固化应答结构研究的方案 and 模式,从而促进互动语言学理论、框式结构理论以及相关语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从理论上,本书系统考察引述声音源自口语交际的双方,即互动交际的双方,以引述对方话语的形式回应对方的引述行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口语中引述研究的空白,或者说是对口语中引述研究的重大补充。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借鉴互动语言学理论、框式结构理论、引述理论,以及语法化、主观化、交互主观化、会话分析等讨论引述回应格式的用法,将互动语言学理论和语法研究有机融合,促进相关语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从实践上看,以引述回应格式为代表的固化应答成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属于难点问题,外国留学生在习得这些“预制语块”^①时往往无法正确地把握其性质、用法和功能,有时即使会使用,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将我们针对汉语口语中引述回应格式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有利于深化外国留学生对固化应答成分的认识,解决“预制语块”习得的难题。与此同时,将固化应答成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辞书编纂、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也可以实现基础研究的实际化。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引述回应格式是频繁使用于应答语中的一种特殊成分,指的是说话人在对引发

^① “预制语块”的概念最早是由 Becker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率先提出的。它指英语中一种特殊的多词词汇现象,介于传统的语法和词汇之间,通常是固定或半固定、模式化了的块状结构。许多语言学者都对预制语块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过研究,他们对预制语块有不同的称呼。Wray(1999)指出,用于描述这一现象的术语有 40 多个,讨论的其实都是本质相同的现象中或大或小的部分。

语进行回应时,借助一定的语言手段,引述前一说话人的全部或部分话语,以此表达对前一说话人话语的态度和认识,由此形成的形式和功能上已经凝固化,专门对引发语进行回应,有时还可以引导后续信息的序列配置。因此,引述研究、回应研究、引述回应研究是本课题研究工作开展和推进的必要基础,文献综述也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

一、关于引述的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期,引述或者转述现象就已经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后来,从语言学、文学到哲学、心理学,引述或者转述研究引起了众多先贤时哲的广泛兴趣,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从语言学角度我们发现,引述或转述研究存在书面语和口语两个研究路向。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引述与转述的关系,有的学者刻意对两者进行区分,如吕叔湘、朱德熙(1978)较早提出“引述”的定义,并对引述与转述加以区分。他们认为,引用别人的话有两种方式,把别人的话照原来的样子写下来的叫引述,又叫直接引;传达别人的话叫转述,又叫间接引。也有学者如黄友(2009)认为引述属于广义的转述。当然更多的学者对二者并不刻意地进行区分,如陈红梅(2010)等。我们认为,说话人面对交际对象,将对方话语中的部分或全部引入自己的话语,以此对对方进行回应,应界定为引述行为。因此,为简化指称,除了必要的强调区分外,本书在讨论时统一采用“引述”这个概念。

(一) 书面语的引述研究

早期关于引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面语上。我们可以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人关注话语引述的表现形式,在柏拉图的《共和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区分了“模仿”和“讲述”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区分,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区分(秦建栋,2013)。国外早期关于引述的研究主要以传统的描写性研究为主。Page(1973),Voloshinov(1978),Leech&Short(1981),Quirk(1985),Weissberg&Baker(1990),Clark&Gerrig(1990),Halliday(1994)等关注了引述形式的分类、区分和转化。其中,Leech&Short(1981)从直接引述和间接引述的视角,将引语划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性引述。Leech&Short针对文学作品把引语分为五大类型,奠定了引述类型研究的基础,后人的研究多在此基础上开展。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不断创新,各种理论如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纷纷登场,引述现象的研究也出现了语用、功能和认知的转向。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国外对于引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书面语。如 Page(1973)认为,小说中人物话语的引述方式多达 8 种类型:直接转述;被遮覆的转述;间接转述;“平行的”间接转述;“带特色的”间接转述;自由间接转述;自由直接转述;从间接转述滑入直接转述(申丹,1991)。Swale(1990)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分析了语言学专业论文中作者对引用的使用情况。Hyland(2000)比较了人文科学学术语篇与自然科学学术语篇中引述的特征差异。此外,Alan Floyd(2000)、Bergler(1992)还对新闻语篇中的引述动词进行了研究。

国内关于引述的研究,早期多见于“引用”辞格的讨论中,还有类似“援引”“用事”“用典”“引语”等提法,被看成是一种文章修辞技巧和手段(黄友,2009)。陈望道(1932)把“引用”界定为一种辞格,并对它进行了定义、分类和说明。后人论及“引用”修辞研究,如张弓(1963)、王希杰(1983)等,都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范式。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国内学界对引述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修辞格研究的藩篱,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刘煜(1986)、申丹(1991)、徐赳赳(1996)、黄国文(2002)、董秀芳(2008)等开始关注引述形式的描写、区分和转化,贾中恒(2000)、彭建武(2001)、黄友(2009)、辛斌(2009)、秦建栋(2013)等从语用和认知角度对引述加以探讨。与国外对于引述的研究如出一辙,这一时期国内对于引述的研究也聚焦于汉语的书面语篇,如刘煜(1986)、赵毅衡(1987)、申丹(1991,1999)对小说中引述的探讨,辛斌(1998)、陈明(2002)、吴红燕(2006)、辛斌(2007)、黄勤(2008)、李金凤(2009)等对新闻语篇中引述的研究,贺灿文等(2001)、唐青叶(2004)、孙迎晖(2009)、李小坤(2011)对学术语篇中引述的讨论。此外,方向红(1998)对引语的语用环境的研究,段晓捷(2003)对汉语篇章中的“直接引述”现象的研究,张新华(2007)从指示、指称的角度对汉语语篇中的转述句的研究,董秀芳(2008)对实际语篇中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混用现象的研究也是从书面语篇视角进行的。

(二) 引述研究的口语转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会话分析开始走上语言学研究的舞台,以及随后 Tannen 等对“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推进,促使学者从会话角度对引述现象进行研究,日常对话和口语语篇中的引述现象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Tannen(1989)较早探讨口头交际中引语的会话功能,她发现,作为对话形式的转述语很少表示“所说的原话”,从而也非“逐字引述”,因为在对话中每一个说话人都有自身的说话习惯、风格、语音

等个人因素。人们接受“逐字转述”这一定义,认为其是对原说话人不同方面的模仿,如词语、语调、音质、姿态等。还因为对话可以是被引述者未说出的话,因此,Tannen(1989)称转述语为“建构的对话”,是他人话语的重建,引述是对总体意义而非准确词语的再现。(张荣建,2000)Thompson 则摒弃根据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范畴对转述语言进行定义的方法,从语言功能角度出发,重新建构对语言转述的认识。他认为,如果说话人或写作者以某种方式标识出篇章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那么源于该声音的任何语段(其表现也可能是隐蔽或模糊的)都可称为语言转述。(Thompson,1996)随后,Holt(1996)、Buttny(1998)、Bolden(2004)等探讨了口语中引述语的功能、引述语的形式,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然语境中引述语的认识。

与此同时,基于应用视角的实时互动引述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涵盖了多个语域,如政治辩论(Kuo,2001)、新闻访谈(Clayman,2007)、课堂话语(Baynham,1996)、日常会话(Holt,1996,2000),法庭话语(Galatolo,2007; Leung&Gibbons,2009)等。Kuo(2001)对政治辩论中的转述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直接引语除了引用之外,还具有抬高自己和贬低对手的功能。Galatolo(2007)对法庭话语这一特殊功能语域中的引述现象的研究颇具特色,他分析了证人言语中直接引语的证据和道德功能,语料调查表明,引述言语行为在法庭中有很高的使用频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言语策略。(罗桂花,2013)

受国外语言学界对自然口语中引述研究的影响,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引述现象。如依据 Tannen(1989)的“建构的对话”理论,张荣建(2000)详细讨论了书面语和口语中引语的不同类型和功能。他认为在口语中,引语特别是直接引语,并不仅仅是“转述他人的话语”,而是“转述”话语行为的众多其他方面。吴颖(2007)从话语角色和会话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对会话中的言语转述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她把言语转述定义为一种行为和过程,打破了传统引语研究中引语和引语转述者之间的研究屏障。马博森、管玮(2012)以四个汉语访谈节目为语料,从会话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汉语会话中的零转述现象。管玮(2014)对汉语自然会话中的转述现象的研究比较系统,他认为转述是人类日常交际中一种常见且重要的语言现象。只要人们告诉他们的听众,某人在某个时间某个场景所言、所写和所想的内容,他们就是在转述。

与国外对自然口语中引述研究的趋势一样,国内的学者也对特殊语境自然口语中的转述现象展开了探讨。彭建武(2001)在对转述重新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翻译界定为语言转述行为之一,并讨论这种转述行为的特殊性。刘娟(2008)通过对庭审



语言的研究,分析庭审中信息处理的重要策略之一——语言转述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相应语用功能,并尝试对口语中语言转述现象的模型进行初步探究。辛斌(2012)以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为例,讨论言语转述的戏剧效果。他认为,引语与转述语境以及不同形式的转述言语在特定语篇中相互之间的动态的作用关系在赵本山小品中制造出了许多笑点和很好的戏剧效果。周兰、唐红芳、罗琪(2013)以《鲁豫有约》中出现的话语转述为研究对象,在对话语转述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之后,从语境顺应层面探讨话语转述作为一种会话策略所体现的语用功能。罗桂花(2013)认为在法庭互动中,转述是一种创造性、建构性、策略性的言语行为。它具有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事转述四种基本形式,同时还具有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混用或嵌套的混合模式。王宇、陈祚瑜(2013)以英文访谈节目中的自然话语为语料,通过定量标记,统计出语料中的零转述现象,并定性地分析了英文会话中零转述的识别路径、特征及会话效果来研究零转述。论证零转述在英文会话中的存在性,并总结出识别零转述的路径策略,探究零转述在英文会话中的特征,并加以分析。

二、关于回应的研究

会话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由“引发语—应答语”构成的相邻对。“回应”行为发生在“相邻对”中的第二部分中,是话语分析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回应”还有“应答”“应对”“答对”等提法,主要成果表现在“回应语”“应答语”“应对语”等研究中。与之相关的研究经历了问句的应答语研究、对话的应答语研究的过程。(张治,2012;孙雁雁,2011)

(一) 问句的应答语研究

这一阶段的应答语研究中,引发语为疑问句,研究的重心偏向引发语,应答语研究处于附属地位。同时,因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入,问句的应答语研究分为两个小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传统语法对应答语的研究,第二个时期是受国外语言学理论影响的应答语研究。

首先是传统语法对应答语的研究。吕叔湘(1956)指出,应对之时,常以一字为答,肯定用“然”、“唯”或“诺”,否定则用“否”。可以说,这是汉语研究史上问句的应答语研究的开始。随后,Yuen Ren Chao(1968)把句子分为零句和整句,整句由零句构成,整句的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朱德熙(1982)认为,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的问句结构不同,回答的方式也不同。是非问句可以用“是的”“对”等

回答,表示同意,也可以用“不是”“不对”回答,表示否定;特指问句要给原问句的疑问词带入具体的“值”作为回答;选择问句则是在并列的项目里选一项作为回答。王力(1985)总结了问语与答语的关系:凡是带“吗”字的问语,都可以答复一个“是的”或“不”;凡是不带“吗”字的问语,就不能单用“是的”或“不”作答语。吕叔湘(1985)指出,回答问题,一般不用全句,只要针对疑问点,用一个词或短语就够了。郭锐(2000)从“吗”问句内部复杂的语义类型出发,对“吗”问句及答语进行考察,发现“吗”问句的确信度和引发出的答语有密切关系。类似的研究还有林裕文(1985),黄伯荣、廖序东(1991),冯雪峰(1994),邵敬敏(1996),陈前瑞、赵葵欣(1998)等。总体而言,传统语法对于应答语的研究附属于引发语的讨论,并且比较零碎,不够系统。

其次是受国外语言学理论影响的应答语研究,人们将“问答”作为整体放入会话中考虑,答语逐渐摆脱了作为问句的附属,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典型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语义角度来看,人们的关注点在于答句的语义类型分类。吕明臣(1989)把答句分为完成型意义的答句和非完成型意义的答句两大类。朱晓亚(1995)着重从答句意义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汉语的问答系统,建立起以答句为出发点的语义类型系统。尹世超(2004a)指出,否定性答句和肯定性答句是以答句与问句的语义、语用关系为标准划分出来的,而不是孤立地以答句是否带否定词为标准划分出来的。尹世超(2004b)以是否带否定词语为根据,把否定性答句分为带否定词语的显性否定答句和不带否定词语的隐性否定答句;以否定的程度为根据,把否定性答句分为强势否定答句、弱势否定答句及一般否定答句。

语用角度的研究与合作原则相关。李悦娥(1998)从功能上将问句的回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肯定的接受型或要求型,是较受欢迎的反应;第二类是推延性回答,是不太受欢迎的反应;第三类是拒绝或表示怀疑,是最不受欢迎的反应。吴早生(2004)依据是否遵守合作原则,将答句分为遵守合作原则的积极回答、遵守合作原则的消极回答、不遵守合作原则的回答三类。

从问答整体角度来看,学界重点讨论的是问答结构。易洪川(1992)将“询问—回答”语对称为“问答对”,认为“问答对”有七种类型,并进一步分析了每一类“问答对”的特点。朱晓亚(1996)利用语用学上的“话轮”和“相邻对”概念,建立现代汉语问答的结构模式系统,分别考察了问答系统中问语和答语的形式特点,以及问语和答语的语义匹配关系。郑远汉(2003)认为,问对是由问话元和答对元组成的,有简单问对和复杂问对两大类。会话中常有问对,问对不同于围绕一个中心轮流陈述的



那种交谈,它有作为问对的交际任务和构成特点,所以必须进行特别的考察。

(二) 对话的应答语研究

这一阶段的应答语研究则完全意识到,除了疑问句,其他句类如陈述句、祈使句等也都可以引出“应答语”,因而研究的视角大大拓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应答语的性质研究。吕明臣(1992)明确提出“应对句”这一概念,他认为,应对句和其他句类一样,是一种功能类型,或者说是主要凭借句子的表述功能区分出的一种句子类别。吕明臣(2000)还指出应对句有两大功能范畴:应酬功能、话语功能。郭凤岚(2007)探讨了汉语日常会话中言语应对现象,并指出了其性别差异。尹世超(2006)明确提出“应答词语”的概念,尹世超(2008)明确提出了应答句式概念。匡小荣(2006a)发现口语交谈中应答语的重叠现象,匡小荣(2006b)还在引发语—应答语基础上提出了他启话语和自启话语概念,进一步加深了对引发语—应答语的认识。

很显然,从性质上看,应答语是表明说话人话语态度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应答者表明态度和话段衔接是同时进行的:在对话中,应答者对发言者的话表示肯定或否定,一方面是表明态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话段衔接的需要。这样一来,“应答语”研究就与话段衔接联系起来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孙希臣(1999)对特殊会话衔接手段及其语用价值;鞠玉梅(1999)对汉英篇章中的语法衔接手段;李悦娥(2000)对话语中的重复结构;肖菲(2002)对会话中的特殊承接方式;郭整风(2004)对“毗邻相关应对”;舒伟、丁素萍(2005)对会话中的间接答语的衔接状态;周利芳(2005)对口语中的肯定、否定类话段衔接成分;邢欣(2007)对包含了关联功能的各种会话语篇衔接词语;周利芳(2008)对表因果关系的话段衔接成分;邢欣、白水振(2008)对语篇衔接语的关联功能及语法化;孙雁雁(2011)对汉语口语问答句衔接语;郭娟(2011)对肯定性反问应答衔接语与简单应答词的比较;郭娟(2012a)对肯定性反问应答衔接语的研究等。

二是基于特定语境的应答语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丰富,分别对特定语境中应答语的应答模式、言语行为、应答策略、应答差异等展开探讨。就特定语境而言,有关称赞、赞美、赞扬、恭维语的应答研究最多,如赵英玲(1998)对英语称赞语的应答模式的研究;汪精华(2008)对现代汉语赞扬语的应答言语行为研究等。除此之外,还有李艳洵(2006)对日韩留学生汉语道歉言语行为及其应答策略;严雪娟(2013)以《家有儿女》为例对家庭抱怨中缓和性应答语的语用分析;东文宣(2008)对中美邀请应答言语行为的对比;廖美珍(2004)对法庭应答语;龙又珍、吴铭(2011)